

消逝的边陲：老越周边华人聚落的变迁*

A Fading Frontier: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Settlement around Lawas, Sarawak

阮光安**
(WAN Kong Ann)

摘要

东马来西亚砂拉越州最北端的小镇老越（Lawas）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极具潜能的发展条件，多年来虽然发展相对缓慢，不过也逐渐获得政府的关注，前景乐观。早年的老越由福建安溪廖姓华人群体奠定了经济基础，后来与广东、客家、海南以及福州华人一同为老越的经济发展做出具体贡献。老越周边有多个马来人与土著聚落，其中六处都可见华人的生活定居与商业经营，尤其是早期以水路联系的村落，华人的板屋商铺成为当地的地标，一度繁华热闹。陆路交通改变了老越一带的经济结构与商业形式，相关聚落的华人生意也受到挑战，有者转型、有者保留、有者离弃，现在几乎都步入迟暮之年。寻访老越周边这六个聚落的华人老商铺，即是为了记录百年来华人在北砂村落乡区的活动与作用，也是为了描述在交通系统提升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迁移和资源集中导致聚落生态变化之际，在地华人如何面对挑战求得自保，以解释华人群体在当地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影响和族群角色。

关键词：老越华人、周边聚落、华人店屋、人口迁移

Abstract

Lawas, the Northernmost town of Sarawak,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has extremely promising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 slow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s gradually gained the attention and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years, different clans of Chinese, especially from Fujian-Anxi, ha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s. Lawas and the variou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nearby have maintained progressiv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have establishe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Transportat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infrastructure has changed Law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ts business model, which in turn have brought challen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With the new economic structure and business model, some communities stayed, others transformed or left. A study on

* 本文获得老越当地多位耆老的协助，感谢廖家謨先生、林美全先生、甲必丹廖初殿及廖加豪先生带路寻访旧迹和引见店家，并提供大量口述材料。

** 阮光安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wankongann@126.com

the six old Chinese settlements around Lawas is not only a record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village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but also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brought forth by changes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urbanization. The migr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that led to ecological changes, how the local Chinese faced the challenges and seek self-protection help to explain the Chinese influence and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ocal social changes.

Keywords: Lawas Chinese, surrounding settlements, Chinese shophouses, migration

一、前言

东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北部小镇老越（Lawas）地处汶莱（Brunei）和沙巴（Sabah）之间，曾经是个商旅往来繁忙的弹丸之地。今日的老越只是一个边陲小镇，行政管理上属于林梦省（Limbang Division），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上个世纪的老越持续缓步发展，至今仍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枢纽作用。近年在出身老越的地方政府部长大力支持下¹（廖宜洁，2010），老越不再默默无闻，在媒体和民间的曝光率有所提升，俨然成为砂拉越境内较具发展潜能的小型市镇。

老越县总面积约3,034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8,385人。全县人口虽然稀少，但也是一个由多种种族组成的多元社会，主要族群有伦巴旺人（Lun Bawang）、比达友人（Bidayuh）、马兰诺人（Melanau）、卡达央人（Kedayan）、达伽人（Tagal）、比萨雅人（Bisaya）、伊班人（Iban）、本南人（Penan）、马来人，以及华人。伦巴旺人是老越地区数量最多的族群（约占人口四分之一），但是这个大族群并不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支柱，他们更多是遍布内陆地区，过着与世无争的简单朴素生活。集中在市区的华人多年来从事商业，自然就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族群。不过经过多年地方政府与州政府的扶助政策，进入商界的马来人也日益渐多，过去几乎全是华商经营的镇区商店，越来越多商铺已是马来人业主所拥有，他们也学习华人的勤奋敬业，欲与华商共享老越的经济蛋糕。

老越县和林梦县联合作为砂拉越州的第五省（The Fifth Division of Sarawak），其地理形势极为独特：与其说是林梦省“把汶莱国分为东西两面”，不如说是汶莱国的淡武廊县（Temburong District）“嵌在”林梦省的林梦与老越二县之间。两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砂拉越北部地区与汶莱国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相较于林梦“夹在”汶莱国中间的奇特地势，老越地点的特性也不遑多让：其东部与沙巴相连、西南部紧邻汶莱、北部出海不远便是纳闽联邦直辖区（Labuan Federal Territory）、内陆地区则与印尼东加里曼丹（East Kalimantan）为邻，海陆空交通还算便利，从经济、军事、运输角度来看，老越可谓是地处咽喉要道，按理说应获得砂拉越政府的更多关注和投入，不过较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砂拉越最北部的关键地区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至今依然是偏僻

¹ 时任砂拉越第二策划与资源管理部部长的拿督阿玛阿旺登雅（YB Datuk Amar Haji Awang Tengah Ali Hasan）是土生土长的老越人，身为N71武吉沙里州议员，他一直很重视老越的发展，多年来积极协助为老越争取到多项发展计划。

的“边疆小镇”，相较于砂拉越其他城镇，老越的潜在价值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发掘和开拓，数十年来发展步伐依然缓慢。（雪兴，1993）

由于老越地处砂拉越最东北端，其镇区距离远在西南的砂拉越首府古晋约1,200公里，距离隔邻沙巴州的首府亚庇（Kota Kinabalu）仅200公里，因此老越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情况高度依赖汶莱与沙巴，古晋及诗巫等南砂及中砂地区对其影响明显较小。老越居民使用的日常用品和粮食等物资，大多是从亚庇使用大货车运来，而较为笨重的建筑材料，还是需要通过货轮从古晋、诗巫或美里载送至此。连接林梦-汶莱-老越-亚庇的马路，是“泛婆大道”（Pan Borneo Highway）计划中砂拉越区北部工程的一环。这段1960年代末竣工的旧路，虽然至今仍未见完善，不过已为老越人民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让老越成为砂、沙两州货物贸易的过境站，从亚庇到老越只需四小时左右的车程，从老越到林梦则只需两个小时左右，陆路交通让这些当年需要通过水路费时费钱方能抵达的地区便捷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便利的交通网和资讯网。

老越境内有两条大河：大老山河（Batang Trusan）和老越河（Lawas River）。大老山河长约150英里；老越河则仅六十余英里。² 在老越的陆路交通尚未开通前，这两条河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水路交通系统：对外从汶莱湾（Brunei Bay）连接通往汶莱、纳闽和新加坡等地航道；对内连接着老越数个内陆聚落。当地土著与马来人村落都是傍水而建，后来华人也是从水路来到老越贸易和定居。

老越现有4间政府中学和29间小学，其中3间为华文小学：一间在老越镇区（老越中华小学）、一间在大老山（大老山中华小学），还有一间在顺达（顺达顺华小学）。老越县的第一间学校，便是1905年创立的中华公所，后在1923年改名设立的“中华学校”，虽然第一批学生仅8人，不过经过百年的春风化雨，到了今天中华学校俨然成为老越镇最大型的华小。

二、老越历史与社会发展文献回顾

有关老越过去的历史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记录，除了散见于80年代至今的报章特稿及新闻，在政府公报及个人专著中亦见踪迹。砂拉越历史悠久的《砂拉越公报》（*The Sarawak Gazette*）³曾在1969年3月至5月连续三期大篇幅连载了在老越中学执教了一年的美国籍和平志愿队队员Leonard Edwards的“老越县历史”（A History of the Lawas District），详尽讲述了老越从英国人统治前直至大马成立后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作者不仅使用了布洛克政府的档案和砂拉越、北婆罗洲、汶莱及纳闽的相关政府文件与个别著作，也采访当地人收集了许多口述资料，加上当地华人侨领及中学学生的协

² 大老山河的主要源头便是林梦省最高峰海拔7,950英尺的姆禄山（Mount Murud），沿河有许多伦巴旺人聚落。老越河虽然不长，但另一连接支流文那卜河则联系着文那卜等地的华人与土著聚落。

³ 《砂拉越公报》（*The Sarawak Gazette*）创刊于1870年8月26日，是砂拉越第二代白色拉者查尔斯布洛克（Charles Brooke）看重的发展项目之一。除了1942年至1946年二战日军占领期间停刊，这份政府公报坚持每月出版一期直至今日，已有140余年的历史，是砂拉越甚至马来西亚少见的“长寿”刊物。砂拉越州立图书馆正在陆续将之扫描存档并上传网上供大众下载使用。PDF版可游览<http://www.pustaka-sarawak.com/gazette/home.php>。

助，作者整理出了一份相当细致的报告，从地理环境、各族关系、政局变化、社会结构、经济生产、宗教生态等数条脉络梳理了老越由古至今的历史发展，其中对老越在日据时期、让渡事件、汶莱事变、参组大马等大事件中所处的境遇都有生动的描写，这篇开山之作成为后来许多相关老越历史叙述不可忽略的主要参考材料。⁴

英国籍圣公会牧师 Sabine Baring-Gould (1834-1924) 热爱考古、民谣和文学，是位不拘一格的学者，他著作等身，出版超过一千本著作。他在1909年出版的《两代白人拉者统治下的砂拉越历史》(*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以流畅精彩的笔法记述了从第一代拉者詹姆士布洛克到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布洛克统治下的砂拉越社会，在当年是公认的砂拉越“官方史”。书中有关林地冒险、海盗、政治权斗、猎头习俗及华人秘密社会等描述都跃然纸上，虽然作者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当时“蛮荒”的砂拉越作出的评价难免有所偏颇，不过这部名著却如实地反映了砂拉越当时的时代形貌和民族精神，为后来学者重新拓展和诠释砂拉越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由于林梦和老越是在查尔斯布洛克时期并入砂拉越范围，因此在本书中也仔细地记叙了拉者如何从汶莱苏丹手中获得这片领土。(Gould and Bampfylde 1909: 377-396)

砂拉越政府民事服务官员郑八和 (Chang Pat Foh) 身兼多职，他是吉隆坡马来西亚皇家亚洲分会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会员、砂拉越政府考试委员会及砂拉越州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也曾是《砂拉越公报》编辑。他出版过多部相关砂拉越历史与社会研究的专著，1999年出版的《砂拉越的传说与历史》(*Legends and History of Sarawak*) 则是对砂拉越的历史发展做出较系统的梳理。书中对砂拉越的每一个省份都有详尽的记录，并且有机结合史实和现况，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砂拉越社会生态。相关老越的记载篇幅不多，不过还算面面俱到，对华人在老越的生存及营生状况也有其独到的解说。(Chang 1999: 370-381)

为了纪念砂拉越参组马来西亚45周年，林梦省公署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曾经分隔、而今相连》(*Dahulu Terasing Kini Terjalin*) 的专题特刊，通过大量历史图片和资料，记录了林梦和老越两地的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这本官方出版的特刊的主调虽然是赞颂历届与现任政治领袖的“英明领导”，不过学者出身的编者也充分发挥了其学术专长，对林梦和老越的历史进程及民生现况进行了客观且全面的叙述。(Sanib, 2009)

除了政府公报和专著，有关老越华人的社会与历史状况也可以从当地各个社团组织的纪念特刊中找到篇幅不多但是内容丰富的记录，例如1996年出版的《老越中华俱乐部庆祝50周年金禧纪念》记录了老越最早社团“中华俱乐部”团结华社共同发展老越的过程；1997年出版的《老越福州公会成立21周年暨会所大厦落成纪念特刊》中的多篇文章描述了老越华人——尤其是福州人——多年来的努力和成就；2010年出版的《老越漳泉公会周年特刊》也叙述了从早年福建安溪闽籍华人到今日不同籍贯华人合作开垦老越的故事。较为可惜的是，许多早年各个华人社团的文档记录和会议记录等

⁴ 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所有材料中较为珍贵的是个人采访记录，因为许多官方文件“都不见了”，而且大部分记录并不注重相关老越的讨论，大家似乎反而更关心老越的“邻居们”，结果是口述资料让作者获得更多信息和更深入感受到老越的丰富历史。

书面史料，都因人事变迁或数次火灾而遗失或毁坏，今天只能从仅存的少量民间史料来缅怀老越华社曾经的荣光。

三、老越开埠与发展简史

公元14至19世纪，汶莱王朝势力强盛，统摄婆罗洲全岛，婆罗洲北部数条大河流域皆是汶莱苏丹的势力范围。直至1845年到1885年间，汶莱苏丹权力下放，将老越河流域一带分封给几个王族管理，老越一带被分割成数个王族的管辖地⁵。（Sanib 2009: 3）当时的老越港口已有近百人居住，人数虽不多，但已让老越河流域成为马来人最大的集聚地，随后不断有马来人从汶莱迁移来此地。

当时，与马来族和睦共处的还有当地土著伦巴旺人，他们与马来人维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除了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他们还贩卖来自苏禄岛及菲律宾的奴隶。以务农为主的卡达央人是马来人与婆罗洲土著通婚的后裔，这个穆斯林族群聚居在甘榜Banting、Belipat及Siang-siang河一带，部分则搬迁到纳闽岛和Labu Bedil。而来自印尼及沙巴的达伽人则散居在文那卜河一带。（陈姿桦 1996: 63）

虽然中国海商与早期的渤泥王国已有长久的贸易往来关系，不过华人群体定居老越，却是较后来的事情。迟至19世纪，一定数量的华人从大陆迁移到马来半岛、新加坡、纳闽及沙巴等英国殖民区，其中不少华人便从纳闽再跳转到林梦一带和汶莱境内，尤其是在二战后，各种内推外引的因素，让老越聚居了不少福建、广东、客家和海南籍贯的华人群体。1950年代中期，来自诗巫的福州人也开始来到老越定居。（Sanib 2009: 138）

后来由于王族势力的式微和政权的转移，汶莱王国下放给统治贵族管理的土地也逐步落入英国殖民者手中。1885年至1902年间，砂拉越布洛克政府的土地已经伸展到紧邻老越河的大老山河流域一带。当时的老越河流域是由本基兰家族的拿督本基兰阿布巴加（Dato Pengiran Abu Bakar）管辖，其行政经验与政治手段皆十分缺乏，不过却将这一带管理得很好，地方平静、治安良好，当时已有不少中国商人在此定居和做生意。1900年间，这里有两个小型市镇开埠，那就是文那卜镇和老越镇。贩卖奴隶成为当时最吃香的贸易。（陈姿桦 1996: 65）

直到1902年，经过谈判和协议，阿布巴加将老越和沿岸土地以年俸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英国的北婆罗洲渣打公司（Chartered Company of North Borneo），据说当砂拉越第二代拉者查理士·布洛克得知此事，“大为震怒”（Edwards 1969b: 79），不过木已成舟，由于协议已定，拉者也只好暂时放弃其土地扩张计划。后来又引发老越河主权问题的法律诉讼与纠纷，为了缓和这个棘手的土地纠纷问题，以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1905年1月12日，老越河一带及相关地区才被转手“卖给”当时的

⁵ 根据记录，当时的老越一带属于汶莱王族的“全权所有地”（hak tulin），Punang区属于Pengiran Muhamad Tali Bongsu bin Pengiran anak Mat Daud；Siang-siang 到Kuala Bunbun一带属于Pengiran Tajudin Hitam bin Pengiran Pemanca；Langarih 到Bunbun一带则属于Pengiran Anak Jambul bin Pengiran Ahmad；Sungai Lawas 和Sungai Merapok流域则分别是Pengiran Abu Bakar和Pengiran Tajudin的属地。这些王族除了在各自属地拥有至高的权势，也在本身管理的地区获得税务及经济等收入。

砂拉越查理士·布洛克政府管理，用以交换北婆罗洲海岸的威斯顿（Weston）的煤矿开采权。由此，老越成为砂拉越最后一个扩张并入的省份，砂拉越的版图扩充至此为止，维持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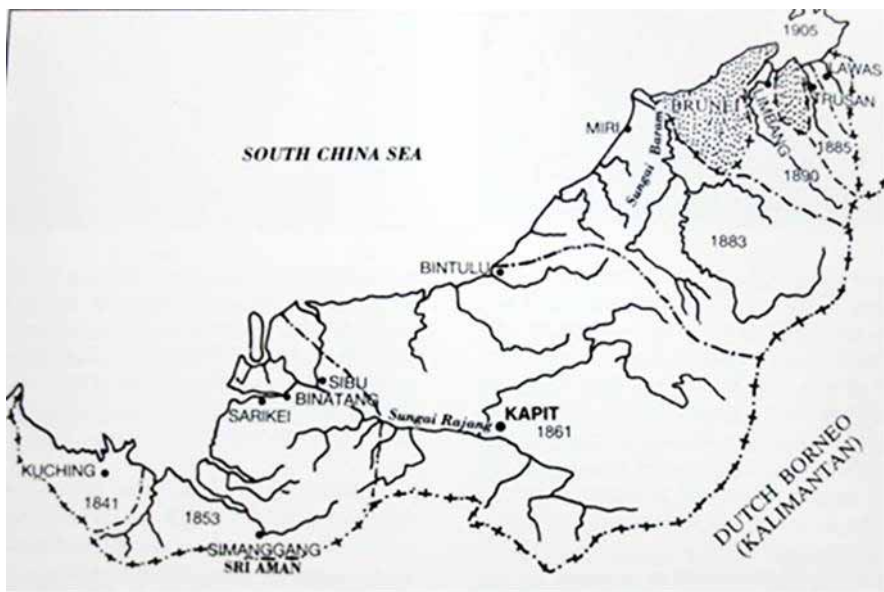


图1：布洛克时代砂拉越领土扩张情况（1841-1905）（Chang 1999: 32）

1933年，一群澳洲籍婆罗洲基督教会（Sidang Injil Borneo, SIB）传教士来到老越和内陆传教，并在老越河对岸的一块由橡胶园主捐赠的土地上设立了一所教堂与行政总部。为解决内陆交通不便问题，他们也建造了一座小型飞机场，1950年5月23日，老越第一架单引擎小型飞机首度在这座机场的草坪跑道着陆。老越的民航服务迟至1957年才由婆罗洲航空（Borneo Airways）提供，当时使用的飞机是仅可载送16人的双引擎先锋机，政府在老越河对岸另辟一民航飞机场。一个小镇有两座飞机场，在砂拉越可算是绝无仅有。除了传教，教会也善用这个便利来服务老越及内陆民众。当时老越的政府诊所虽早在1931年已经建立，但一直没有进驻医生，许多医疗服务便是由这个教会进行。因此，婆罗洲基督教会不仅改变了此地伦巴旺人的人文教育与宗教信仰，也为老越的卫生及医疗设施作出关键贡献。（廖初殿 2010：51）

二战期间，老越也因砂拉越沦陷而蒙受战火洗劫：华人商店被掠夺、华文学校与马来学校被合并改教日文、华社机构产业被没收，百业尽废、民生困苦。除了强占工厂，日军也强行合并两家华人商行作为指定米粮代理商，以应付战时军需⁶（陈姿桦 1996：

⁶ 强占工厂，是指日军统治期间，将1920年设立的“Vamco Sawmill”板厂易名为“Ni Pon Co.”以占为己有；合并商行，是指日军为了提高农业生产以应付军需，将从四周村落购得的米粮交由指定代理商“顺德公司”负责出口。这家“顺德公司”其实是将当地两家华人商铺“源顺”和“云德”合并而成，两家商铺业主无法违抗日军，只能从命。

66)。战时老越的全部木板店屋和唯一的大伯公庙都遭受联军飞机轰炸而尽数焚毁，直至战后至少一年时间才逐步恢复元气、重新发展。

英国殖民时期，老越进入另一阶段的发展。1947年，老越第一届咨询议会（The First Lawas District Advisory Council）成立，议员由马来人、伦巴旺人和华人组成。1949年，林梦和老越两地各派6位代表到林梦与省长开会，老越华人唯一代表便是民选第三任甲必丹廖乌务。1950年代，由于韩战爆发，树胶价格飙升，许多商家获益，当时老越最大的橡胶园 Lawas Rubber Estate 园主为英国人，1958年，廖乌务联同数位汶莱商人合资57万元收购此园区，将这外资企业转为本土公司。（廖初殿 2010：50）1959年蜚声地方立法议会的麦耀琳立委获选为州议员，他在后来1962年大马计划倡议之始，受委任为联合国民意调查团的协助成员，扮演关键角色。（骏盛，1999）

1962年12月8日轰动一时的“汶莱事变”（The Brunei Revolt）爆发，汶莱人民党领导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在文莱发动武装行动，攻打北婆罗洲（沙巴），邻近的老越、林梦、美里等地也受到波及。英殖民政府在出兵平乱的同时，也宣布砂拉越进入紧急状态，并展开大逮捕行动，一时人心惶惶，砂拉越局势急转直下（田农 1990：25-27）。汶莱境内、林梦等地都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老越却没有发生任何枪战。这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据知叛乱前被英国视为违法的汶莱人民党老越支部就设在顺达，而且早在11月24日“北加里曼丹国民军”的重要人物Kapt. Sabli Bin Hamid便是在当天凌晨四点半在老越中华俱乐部被英军捕捉，之后该党在林梦和老越一带的多名关键人物都陆续被拘禁（Said 2010：96-98），谣言四起没多久，叛乱就爆发了。或许就是因为处在风口浪尖，老越当时被英国海军陆战队严加驻守，仅一周就平定叛乱，汶莱欲“夺回”老越和大老山的计划也就失败了。（Edwards 1969c：114-115）

1963年，随着砂拉越和沙巴加入组成马来西亚计划，老越也就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近几年来，砂拉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老越进行了几项大型发展工程，其中包括了食水过滤站、新政府医院、中小学、大老山大桥、移民厅及县议会办公楼、河滨公园、休闲广场、新酒店等，明显提升了老越镇区的基础设施和民生需求的水平。

四、老越的华人群体

和许多东南亚地区的市镇一样，华人群体在老越早期（至今）的经济与社群活动中都扮演着关键的作用。从开埠前至今日，老越一带的华人居民主要还是以祖籍福建安溪的闽南群体为主。散布在老越镇区和郊外的华人商家长期以来经营着各种买卖，主要顾客都是附近的马来族和姆禄族同胞。

民间传说，早在1406年，明朝郑和船队途经渤泥（今汶莱），停靠之处便已有中国商人于老越一带经商。数百年前，非本地人在婆罗洲河海流域走动还是十分“危险”的⁷（Edwards 1969a：54），因此，来到此地的个体中国人为了有效且安全融入当地生活，除了习得当地语言，也多选择与当地姆禄族土女通婚，既可免除被土著社群排斥敌视导致杀身之祸，又可获得当地土人的认同与信任，让他们得以顺利在当地务农及经商。（Chang 1999：378）

⁷ 这里所谓的“危险”，除了变幻莫测的水文和水中猛兽，便是受到当地土著的袭击与掠夺。

至于华人群体的定居则迟至1846年间，英国殖民者控制了纳闽岛，引进华人劳工，华人群体逐渐进入汶莱马来人、卡达央人与伦巴旺人的村落。来到此处的华人先是务农，尔后条件具备了，则进一步贸易经商。他们以船只从纳闽运送建筑材料与日常货品到大老山和老越，最初以木板屋小商铺开始经营小本生意，因此除了橡胶园，华人社群也较集中在镇区。华人群体由此缓慢但稳健地在老越一带成长为一个主要的群体。根据砂拉越州统计局早期统计，1905年间，老越镇区、大老山镇区、文拿卜，及小部分的本南、瓜拉老越和顺达地区，华人人口仅百余人，到了1941年，华人人口已增加到约800人。（陈姿桦 1996：64-65）根据砂拉越州统计局的数据，从1960年到2000年，老越华人人口由1,528人增加到3,269人。（Sanib 2009：131）时至今日，老越县的华人人口预计已达6,000人，占全县约15%。⁸

老越华社最大的特点，便是当地居民大多姓廖，据悉十年前仍约70%的老越华人皆是福建安溪廖姓人士，有者属亲戚关系，有者则仅是同乡同姓。（吕惠蒂、李宜福，2010）根据学者的考察得知，目前在马来西亚，福建安溪廖氏主要聚居在两个城镇：一在西马来西亚彭亨州内陆的直凉（Triang），至今已繁衍千余人，是福遂公派裔四房与五房人士；另一则是砂拉越老越，是福遂公派裔长房、三房和六房人士，战前约有数十户人家近百人左右。（廖文辉，2015）

今日在老越一带数千名华人人口中，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廖姓人士，若说随处可遇姓廖的人应也不算夸张。这或可归功于一百多年来自福建安溪的两位廖姓港主——廖金柳和廖修安（于翔，1992），以及廖乌务、廖美兴、陈文音、廖日保等先贤。19世纪初，这批廖姓商人来到婆罗洲经商，回程经过老越河口，逆河而上之际发现两岸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只有少数姆禄（Murut）土著居住，于是在返国后带领近十家廖姓同乡移居至此地定居。据说到了1908年，老越埠上村里的九成居民皆姓廖，是个不折不扣的“廖家村”，于是有人就将这个闽南村落命名为“廖处（厝）港”以表自豪与纪念，而成为老越的早期名称。（萧特财，1990）

近亲同乡住在一起，可以互助互济，是件好事，不过廖家村在某一段时间也面对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那便是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后，在当时较为封闭局限的人际网络中就面对嫁娶的困难了。于是有钱人家便会通过中间人，从中国“进口”新人，只不过由于交通不便，路程又远，有时一门亲事往往要花上三五年，成与不成还是未知数。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或是要求“快事快办”者，便会“就地取材”与当地土族通婚。（常燕华，2001）因此在老越也有不少华土混血的新生代，有者能讲流利华语，有者则使用着中文土语相混杂的地方方言。

1930年至1940年代，广东、客家与海南籍贯的华工也陆续来到老越。广东、客家人主要以务农为生，他们多种植果菜和胡椒。海南人则以从业茶室著称。1950年代初，时值战后百业待兴，来自诗巫新珠山和后埔港的兴化劳工，由同是兴化籍的著名建筑商张各色带领来到老越大事发展，建造蓄水池和四排37间商业与起居综合双层木板店

⁸ 这个数目实际上只是根据人口增长趋势粗略计算，在这数千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长年在外地工作、深造和生活的老越年轻人，实际上居住在老越和长年在镇区活动的华人最多只有半数。

屋。数年后工程完成，只有吴清忠、吴清山两兄弟定居下来，继续从事建筑行业。到了1960年代中期，老越的兴化人渐多，大多从事起卸木桐工作。（吴德华，2001）

成排的木板店屋似乎成为上个世纪砂拉越各地华人商业经营和贸易活动的典型标志，这些坚固实用的店屋代表了华人在当地的辛勤成果之一，无奈的是这些木板店屋经过多年使用，建材大多已十分干燥，最大的隐患便是火灾，全砂各地早期华人店屋几乎都难逃大火洗礼的宿命，导致至今保存下来的店屋并不多。以老越的四排店屋为例，当年这数十家店屋奠定了老越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但是福祸相依，1988年7月11日老越香山酒店旁整排店屋顶楼被大火烧毁，同年9月25日时值中秋节凌晨的一场大火将廖修安路的整排十三间木板店屋付之一炬，1989年3月6日属县顺达全镇华人店屋被大火夷平，1994年1月18日凌晨又发生大火将廖金柳街的八间店屋焚毁造成百余人无家可归。（廖初殿 2010：54）这几场火灾令老越华社蒙受巨大损失，不少家庭多年奋斗的成果一夕尽毁，惨况令人痛心疾首。当地华人痛定思痛，经历过战火和祝融的考验，在废墟中重建家园，三层新店屋在旧址的矗立表现了华人坚韧不拔的精神，而在火患发生之际当地居民不分种族合力救灾，以及灾后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尽力赈灾的表现，都反映了老越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

1950年至1960年代，砂拉越政局动荡，左翼思潮在当地华社甚嚣尘上，社会主义运动在砂拉越中南部盛行，导致英殖民政府与民间的关系紧张。社会混乱、时局不靖，迫使诗巫的福州人往外迁移寻求活路，其中便有部分福州人来到老越，最早来到老越的福州人是许胜（信）明一家，他先在1952年只身来到老越，租用一位印度人的住家经营相馆和修理脚车。另外在1950年代末也有一批旅居汶莱的诗巫福州客工，以黄世旅、刘宗（琮）英、蓝云祥、张明泰、陈作台、许其钦、黄家志等七人组队搭乘货船来到老越，他们勘察了老越西北方的 *Kampung Belimbing* 及大老山一带，相中丘陵地带的老越-大老山半路，在时任通讯局局长王耀生的从旁协助，向英殖民政府申请开发垦场，获得白人县长拜斯首肯，于是福州人分两批人马来到老越，先是1958年在大老山路6至8英里的 *Siang-siang* 地段山丘开辟320依甲种植树胶，再是1960年继续开发8至9英里的二百余依甲橡胶园。之后陆续有人回乡携眷前来定居，至今老越约有九十余家八百余人福州籍华人，遍布在老越各行各业。（林美全 1997：85）

据悉在1969年，由于福州人的大量迁移，第五省的华社代表在林梦召开会议，商讨是否可让大批外省人迁居到第五省。会上林梦省华人代表大多持反对意见，认为外来群体会影响当地华人生计，并且不同籍贯之间容易发生“麻烦”，当时老越的唯一华人领袖代表本固鲁张春年力排众议，他认为福州人“节俭肯苦干”，必会给这个地方带来发展和繁荣，所以支持让福州人来到老越。张老先生的言论也获得会上众人的重新估计，最后大家改变主意，议决先让一批福州人到林梦定居，之后再迁往老越谋生。（萧特财，1990）

福州群体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老越华社的经济状态，也改变了老越华社的方言群结构。福州人克勤克俭、勤奋非常，来到老越多年后，也成功在当地获得不少资源，一跃成为影响当地经济的主要群体之一，一度掌控在闽南人手中的资源被打散，难免导致一些老一辈的闽南商人对福州人颇有微言，所幸到了后来继承事业的年轻一辈华

人，这种籍贯之间的隔阂与成见已不复见，现在大家都是以实力公平竞争，也一同为老越的经济与民生献出一份力。

五、老越周边聚落的华人商业

老越自1954年设立了县议会（Majlis Daerah Lawas）开始，所有行政工作与发展计划便以老越镇为中心展开。道路、商店、通讯、水电供应、住宅区、公共设施等建设，皆集中在老越镇区。不过周遭的聚落长年来也散居着不少居民，许多地区都是自然村或集散地，尤其是华人聚居的地区，更是因经济效应而一度繁华。除了较内陆的地区如 Long Semadoh、Ba’Kelalan、Long Sukang几乎不见华人据点，老越四周交通较便利的地区，尤其是大老山河及老越河下游和靠海口处，以及沿海一带，都有华人与当地土著共同生活的印记。后来陆路开通，这些周边地区的生活与经济形式都受到影响：年轻人大多都前往老越及其他城镇打工、举家搬迁到老越县区的也不少、留在这些村落的几乎都是老人与小孩。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群体，当属华人社群，因为社区环境的变动，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经济活动——曾经客似云来的店铺如今门可罗雀，原产品大多都直接运送到镇里销售个更好的价钱，买东西只需搭车花点时间就可到镇里选择更多……总之，各种资源都集中到老越镇区，而这些一度热闹繁华的小型商业中心便急促退出竞争市场、乏人问津了。

面对这种环境的改变，这些地方的华人既表现得充满弹性随机应变，又似乎无法舍弃曾经的努力而显得保守被动。说他们随机应变，是因为许多华人商家在这些聚落获得利益后，后来也投资到老越镇区，购买房产或另起炉灶开“分行”，这也展现了华商“永续经营”的精神。说他们保守被动，是指仍保留在这些聚落的老旧店铺，天天开业却没有多少顾客，所作的买卖也多是赚头极小的零售物品，在此做生意明显已无“钱途”，不过却有商家依然愿意继续坚持经营，一来是维持与附近居民的多年主顾关系，二来是不舍上一代留下来的产业，因此虽然生意难做，只要一早把店门打开，又便是惨淡经营的一天。



图2：老越周边六个华人聚落

大老山、顺达、阿瓦阿瓦、本南、瓜拉老越、文那卜，这六个老越周边聚落，都可以看到华人生活与经商的印记，经过百年的刻苦经营，华人基本上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不过由于各种变数而导致人口的迁移，让这些地方的华人也只能随波逐流，顺应社会形态的改变而设法求存。当年在这几个聚落所建起的店屋，便是当时的产物集散地和商业中心，规模或许不大，却已算是那时候当地的地标，居民或旅人从河上划着船来到，只要见到一排排的店铺板屋，便知道已抵达相关聚落的“中心”，因为只有这里可以找到所需商品，甚至住宿及其他服务。

随着交通系统的逐步发达、城区规划的不断发展，这些当年辉煌一时的华人商店，其商业性作用大多也被镇区更为集中和宽广的新店屋所取代。在城市化发展的潮流中，新陈代谢在所难免，这些店屋，有者只剩下废弃的断垣残瓦（如文拿卜），有者日渐破败没落已是“时日无多”（如阿瓦阿瓦），有者稍见转型而得以继续经营（如大老山）。今日眼前所见，虽已不复当年的生意兴隆，但是以现存的建筑规模与环境格局来看，仍不遥联想到当年的盛况。和日渐繁荣的老越市镇相比，这些周边聚落明显已无竞争力，在各种维系条件逐渐散失之际，要维持现状都略显吃力，不过以当地居民与店家的生活状态来看，大家虽然对前景并不乐观，但是依然保持一种难得的安然心态，日子还是过得悠闲自得，虽无远虑，也无近忧，充分显示出小地方生活的安居乐业与安分守己。

寻访老越周边这六个聚落的华人老商铺，即是为了记录百年来华人在北砂村落乡区的活动与作用，也是为了描述在交通系统提升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迁移和资源集中导致聚落生态变化之际，在地华人如何面对挑战求得自保，以解释华人群体在当地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影响和族群角色。

（一）大老山

大老山地处老越西面，再往西便是汶莱，距离老越市区约21公里，其巴刹（市场/Pasar/Bazaar）便在大老山河边，背山面水，风水极佳。从林梦省前来老越的居民或访客皆可途经汶莱（入境再出境）经过大老山进入老越县。

早在1905年布洛克政权扩张到老越一带，当时的老越依然是穷山恶水之地，紧邻汶莱的大老山开埠比老越要早，是汶莱湾唯一的贸易中心，附近村落与河流一带的居民便到此处与汶莱马来人、中国人及新加坡人进行交易，土产货物也由此出口途经纳闽运到新加坡，反之进口货物便是由新加坡经纳闽运至此地。当时的大老山以此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成为老越一带经济贸易与人口迁移的集散地，早年不少华人应该也是通过水路由此上岸。（廖文辉，2015）大老山便因地理和交通之便利而成为老越县的中心，老越反而居次位被划定为属县（sub-district）。当时布洛克政府的行政楼、县公署（District Office）、警察局等办公设施皆设在大老山。

大老山的经济发展在1940年代达到高峰，据悉当时的华商以进口商品跟当地土人收购土产（有者甚至是以物易物），廉价买入高价卖出，一单生意可赚至少两倍，商机处处加上刻苦经营，当时的华商由此积累了不少财富，间接为大老山的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到了1950年代中晚期，陆路交通开始兴建。1963年，老越-大老山公路通车。有了四通八达的大路，长期依靠水路的大老山经济明显受到极大的冲击。土人觉

知他们的土产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不用再依赖当地华商寻得出路，便利的交通也提高了来自附近地区（尤其是汶莱和老越）的商业竞争力，让大老山的华人商铺来不及转型之际，逐步走向没落。

失去经济竞争力和政治重要性的大老山随着政权的更迭退到发展的后台，取而代之的便是一度被冷落的老越。老越的崛起虽然比大老山迟了许多，不过由于地处陆路交通的枢纽，老越完全代替了大老山成为新一轮的经济与行政中心。大老山现在倒过来成了老越县的一个属县（另一属县则是顺达），建有较完整的行政系统与基础设施。除了两排16间木板老店屋、两排15间钢筋水泥新店屋及散居的住家，大老山还有自己的属县公署、行政中心、警察局、医务诊疗所、政府中学（SMK Trusan）、政府小学、政府育幼园（Kelas Tabika Perpaduan）、华文小学（大老山中华小学）以及一间“大老山福德宫”大伯公庙。

大老山目前约有5,000居民，主要是伦巴旺人，马来人与华人次之。据估计大老山华人约400人，不过其中两百多人都在外地谋生，留在当地的华人仅百来人。当地土著居民大多从事农业，以割树胶、种植香蕉、稻米和玉米等农产品，而华人依然是主要从事商业，故无论是旧店屋还是新店屋，几乎都是华人商号在经营。老店屋末端不远便是大老山河，在陆路交通尚未开通之前，老越居民便需从这里坐船去纳闽或林梦。早期华商善用大老山河的水路交通，以货船载送各种货物到大老山河边的高脚木板店屋进行销售，政府也在附近河岸建造一座稳固的咸木码头，供运货与载客之用。早期大老山的经济活动便是以这两排店屋为中心辐射开来。

实际上现存的两排老店屋已是后来重建的，原来的双层老店屋在1980年代中期被大火焚毁，政府便在原址建起两排临时单层店屋，让灾民继续进行贸易与生活。直至1993年至1995年间有关当局在另一侧高地建起两排15间双层钢筋水泥店屋，本来计划是将老店屋的商家搬迁至新店屋，不过商家在老店屋住了多年，大都意欲留在原地不愿搬迁，政府无奈，只好另觅买家买下新店屋，而老店屋区便不再有商业经营，只有部分家庭继续在此生活。由于当年建起这两排木板店屋只是应急之用，并无详尽策划，用料也较劣，因此不少已经在风雨中损毁，有者因长年空置缺乏维修已倒塌，余下的十余家则因还有人住，破败之中仍见人气，屋里也还算干净整洁，应还能维持数年。不过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估计不上十年，这两排老店屋也势必废弃，就只剩下新建的两排钢筋水泥店屋。老店屋的居民大多在老越镇区或其他地方早已安置物业物产，因此也并不担心老店屋终将消逝，只是当前仍不舍搬离，维持着当前的“安闲稳定”状态。

（二）顺达

顺达在行政上也是老越的属县，地处老越西北，距离老越30公里，散居着百余家马来人，此地华人较多，但是也与当地马来人一样，住在高脚屋。目前有两家华人商店，皆是廖姓人氏所有。（廖文辉，2015）1989年3月6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顺达镇全数两排16间双层店屋，这些商铺多是华人业主拥有，而后来重建的新店屋，现已多是马来商家经营。

今日的顺达自然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此地有了数排水泥店屋，还有政府中学、政府小学、移民厅、菜市场及民众会堂等设施，供当地居民使用。除了数间华人商店，镇区再无其他与华人相关的建筑或场地。

顺达目前仍有一间华文小学——顺华学校，或可说明早期此处住着不少华人。顺华小学和许多乡镇的华文小学有着同样的命运，那便是时至今日，学生人数逐渐减少，而且在籍学生中华裔子弟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当地的马来裔或土著学生，据悉在读的70余名小学生中，仅有4个华人子弟，从行政到教学再到校风，处处都显露着中华文化元素被淡化和忽略的微妙氛围。

（三）甘榜阿瓦阿瓦

甘榜阿瓦阿瓦地处大老山河出海口，是个漂亮的马来渔村，据说这个由四个甘榜组成的渔村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目前这里约有150栋房子，居民超过2千人，整个村子都是建在水面上的高脚屋，屋脚大多高出水面数米，是个典型的“水村”（*kampung air*），村中水路纵横交错，95%村民都是渔人，他们也从事海上网箱石斑鱼养殖业，以备在季候风季节海上风浪过大无法出海捕鱼之际仍有稳定收入。不过据观察这项海上网箱计划实施得并不十分成功。

家家都有自己的船只，河上不时可见来往的小船，数百间板屋都以木制小桥连接起来，木桥和部分住屋下方可行小船，以摩托小舟在村屋间穿行，视野极为独特，别有一番风味，是极具旅游潜能的地方。

阿瓦阿瓦村距离顺达镇约15公里，往北就是南中国海，天气好时若是往北方望去，据说可以看到沙巴外海水域的联邦直辖区纳闽岛，而往东北方向望去，据说可以望见东南亚最高山峰京那巴鲁山（Mount Kinabalu），而往西便是汶莱湾，因此这个村子较多居民属汶莱马来人、砂拉越土著和沙巴人。村民大多口操汶莱腔马来语，不少村民在汶莱依然有许多亲戚，汶莱沿海渔村也时常乘船与这里的村民交游往来，两国村民自由交际一路通行无阻，形成一道别具特色的海上交通线（钟谥有，2010）。

据说不少本村村民拥有两张身份证，即是马来西亚公民，也是汶莱公民。而一些地方领袖的家里，据悉有两个客厅，一般使用的小客厅墙上挂着砂拉越州元首及首席部长的照片，而招待贵宾用的大客厅墙上则是挂着汶莱苏丹的画像，其中用意不言而喻。当然，这个情况是否属实，还需进一步确认。

这里仅有一家华人，经营杂货铺，店名“援利号”（Chop Siew Lee），现在的业主是第三代华人，刘贵云先生，65岁，祖籍福建永春，是老越县仅有的三家永春人氏之一，现一家四口（夫妻与两个儿子）住在这间河边的高脚店屋里，店屋与对岸的马来甘榜遥遥相望。这间店屋是战前所建，并没有任何地契或准证，只是经过多年的营业，当地村民已十分熟悉这家“援利号”杂货铺，平时也会有附近渔民或村民前来购买一些渔具或杂货，刘先生的两个儿子都留在店里“帮忙”打理生意。“援利号”的生意明显很差，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一角五仙慢慢收”，毕竟是自己的生意可以“加减拖”（尽量拖延着做），而且一家人也习惯住在这里，“要做就做，要睡就睡”，没有生意时也可到河里抓些鱼虾度日，不似在镇里的消费多。

经过三代人的经营，这家杂货铺已经步入迟暮，河岸这一边正在进行一项美化工程，当地政府计划建一座大桥，以连接起此岸的小镇和彼岸的甘榜，而且清理了沿岸草丛，计划在此地建设餐馆、公园，希望可以推广旅游。“援利号”的位置就正好处于美化工程的范围尾端，据刘先生说，政府“赔偿”了他1万5千令吉，让他在附近高地买下一块地皮建屋。且不说这笔钱用来购买建筑材料已算杯水车薪，据他所知其他马来人家庭获得的赔款几乎都是他获得的三至四倍，这令他心里很是不值。更何况美化工程竣工后的食摊生意都只给马来人投标，过去政府津贴给村民的冰冻鱼虾用冰箱、船只摩托等，也仅限马来居民申请，“都没有华人的份”。这种处境令刘先生不满，但是他也深知自己的“非土著”身份，并不过度争取。可惜的是，这家经营了三代的店铺，早已破败不堪，店家也不再花心思去维修，因为“随时要搬就搬”，明显有结束营业的想法与计划。

（四）本南

本南是一个沿海的马来人村落，地处老越东部仅12公里。这个传统的马来渔村地处汶莱湾沿岸浅海区，地势极低，环境清幽，水质极佳，盛产烟熏丹邦海鱼（Ikan Tahai/Ikan Tamban）和江鱼仔，这里生产全老越县品质最佳和数量最多的熏鱼，不仅供应本地市场，也出口国外。而每年四五月江鱼仔盛产季节，村民在木板长桥曝晒江鱼仔的景象蔚为奇观。河口广阔的红树林区也是萤火虫繁殖地，加上干净洁白的沙滩，极具休闲旅游的发展潜能。

本南现有近百家马来人高脚屋，早期此地有数间华人商店与住家，但现今不仅已全数搬迁到老越镇区，连老建筑也尽数被拆除，仅存留一间废弃的双层木板店屋和一间钢筋水泥双层店屋，业主为老越显达廖冠英。（廖文辉，2015）

（五）瓜拉老越

瓜拉老越是地处老越河口的马来甘榜，距离老越市镇仅14公里，陆路水路都十分便利，从老越前来只需半小时车程即可到达。由于是出入海口，此处的水面十分宽阔，两岸目测约有一公里距离，河岸两边遍布高脚木屋，约有一百余间，都是马来人住家。这里也有一间红新月会医务所、民众会堂、海关税务局、电力局、政府小学，以及一间宏伟的回教堂。这里的近三千汶莱马来居民多是捕鱼为业，也有人造船和织网补贴家用。此地民风淳朴，平时鲜有大型活动，逢年过节，居民多是到教堂礼拜聚会或者在家中自行庆祝。当地一间小型民众会堂则是在政治人物如部长或代议士到访时才打开充作官方活动用途。

瓜拉老越东岸的Kampung Datu便是现任砂拉越第二首席部长（Deputy Chief Minister）拿督阿玛阿旺登雅的家乡，西岸现在还保留着八间属于华人的高脚木板店屋。据悉在繁华时期这里多达十余家华人商店进行各种贸易，如日用杂货、捕鱼用具、船只机械等。华人在战前已经在此地经营商业，不过旧的亚答店屋在战时被焚毁，战后在旧址附近重建的店屋多是迟至1985年底才扩建的。这些店屋经历过两次重建，基本上没有太大迁动，只是每次重建都会往河面移去，所以现存店屋都已是完全立在河边水上。往河面建屋的理由是由于早年此地水路交通发达，对岸甘榜的顾客皆

是使用船只前来光顾，所以为了方便客人，华人店家便建造出适合船只停泊的“码头式商铺”。这里的店屋全部没有地契，据说只需要跟Pengiran村长商讨议定，就可以自行在河边水上建造，可见这个马来村落的包容性和接纳度都很高。

这排店屋面向大河，店前走廊与走道皆是木板搭建而成，并且有一条极长的走道通到前方近百米外的码头，这是由于此地乃沼泽地区，退潮时河岸便是一片泥泞湿地，而涨潮则水淹数尺，因此为了方便诗巫、美里来的货船上下货物，店家多在码头边再建一栋小屋，作为临时货仓，不过有了马路，所有货物皆直接从老越运来，码头和货仓便都闲置废弃了。在未有陆路交通之前，对岸的马来居民都需要坐船到这些华人商铺购买各种商品和建材，后来政府在两岸都建造马路，现在两岸居民都可以直接使用车辆通往附近城镇：西岸直通老越；东岸直往实必丹。一度繁忙的河口现在只有几艘小船偶尔来回，商铺的生意一落千丈，商铺从早上六点半开店到晚上八点，只有在上下班时段会有些生意，平时就偶尔有一两个顾客前来买些小东西。

目前此地的八间华人商铺，仅存两间依然开门做生意，一间是“金顺发”，业主姓施，另一间为“南益公司”为廖姓业主拥有，两家皆经营杂货生意。两家商铺都各只有业主与长辈两人居住，其他的家人族人大多都在老越或外地工作或读书。不过这里还依然是两家人的“祖屋”，逢年过节，尤其是农历新年，全部家数十人都会回到这里吃团圆饭。

瓜拉老越在1958年有一间华文小学“侨光学校”，不过由于战后华人口迁移原因，学校因生源不足，早已在1965年间关闭，所有资料不复存，只知现在“金顺发”的65岁业主是这间小学的毕业生。

（六）文那卜

文那卜是砂拉越最尾端的乡区小镇，地处砂拉越与沙巴两州的边界，是砂沙两州人民出入的主要关卡（checkpoint）。文那卜在老越的东北方，距离老越镇只有32公里，东部紧邻沙巴州的关卡新浪敏（Sindumin）。文那卜河流经此处，是战前华人上岸的口岸，也是森林土产和货物的集散地（廖文辉，2015），这里住着三千多名伦巴旺人，也有一个百余户家庭的马来甘榜，还有卡达央人及华人散居。这里有一所政府小学，学生可享免费教育，但是当地华人大多将孩子送到邻近的新浪敏新文国民型华文小学接受教育。现在的文那卜大路边较集中的一排单层洋灰商店，多是华人经营，这里是旅客对文那卜的印象，而实际上以前的文那卜商店，则是在大路另一侧靠河岸边的木板店屋。

1950年代，文那卜十分热闹，既是小型商业区，又是老越和沙巴的水路中转站，船只与商旅往来不绝，许多廖姓华商看中这里的经济潜能，便选择在此地投下重金建起高脚双层店屋。如今要寻访这排店屋，必须从现有的大路绕过猪笼草标志交通圈再转入小路，方能来到河边的这排废弃店屋处。

由于这里地势较低，雨季会面临河水暴涨淹水之虞，所以整排店屋都是高脚结构，屋子高出地面约一米，下方空置以避水患，建造成本自然倍增，不过所用材料皆是上等建材，楼层也比一般店屋高大，不难想象当年建成之时的宏伟壮观。类似的店屋在砂拉越许多沿海或河边华人聚落都可见到。

店屋斜前方约100米便是文那卜河，河道不大，但水深流缓，据知还有许多鳄鱼栖息河岸。这条河与老越河相通，河边建有一座盐木码头，当年这里商业发达时，每天都有两趟船只运载服务，早上下午各一趟，来回文那卜和老越，载人运货。后来减少成一天一趟，再后来就不再运作。

靠近文那卜河的角头间两间店屋，为一廖姓老妇所拥有。她老人家心胸宽广，将店屋楼上空间设置为客房，免费提供给途经文那卜的旅客与商人食宿，要住多久都不成问题。老妇的善举，一时传为美谈。

相较于大老山、顺达、本南等地的木板店屋，文那卜的店屋数量极少，不过其他地方的店屋多曾遭过火灾尽数焚毁，现存的老店屋多是重建过一次，而文那卜的店屋虽已废弃，却因未曾遭遇火患而保留了早期的建筑形式，这应是硕果仅存的早期店屋了。

当年建起一排双层木板店屋，共八家商铺，也几乎都是廖姓业主。商店数量虽然不多，不过从店屋的规模和结构来看，以当时的标准已算是“大店”。店前有宽敞的“五脚基”走廊，走廊边沿则有整排的长条木板充作座椅供人憩息。每间店面各可容纳数十人，因此可知当时这里人来人往，生意不错。店屋呈狭长型，上下同宽，楼下做生意，楼上则是住家，后侧则是仓库、厨房和盥洗室。而今这排店屋已荒废多年，屋身被虫蚁蛀损，外部也爬满爬藤植物，四周杂草丛生，破败之状惨不忍睹，不过屋身尚算稳固，估计三五年内不会倒塌。⁹

目前文那卜已没有其他任何商业建筑，连接老越到沙巴境内的马路通车后，沙巴地方政府也大力发展在砂沙边境的实必丹（Sipitang）小镇，由于地点和交通比文那卜更便利，经济发展也逐渐超越文那卜，加上文那卜河的水路交通不再比陆路方便而遭到弃用，于是文那卜原来的店家都搬迁到实必丹，一度繁华的文那卜小镇就荒废了，现在除了店屋左侧后方有一家廖姓华人居住，附近已不见人烟。但是靠近马路边有一座大伯公庙，是文那卜与新浪敏两地的华人共同集资建立的，所以也称“文新福德宫”。

这间神庙的选址较独特：庙的四周皆是马来甘榜，而不见华人住家。庙不大，右边有一雨盖礼堂，庙里供奉着福德正神、关帝圣君、观音大士、齐天大圣等神祇，庙外左侧则另间一小屋供奉土地公。庙内不见任何碑铭，只知壁画为砂拉越早年知名画家刘福于1989年所画，赞助壁画的善信多是廖姓人士。庙里虽无人看管，不过供桌地面皆十分干净，可见有人每日照顾。平时神庙并无善信前来上香礼拜，不过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四大伯公圣诞都会有善信前来祭拜和聚餐。一间安静的小庙，和一排废弃的店屋，记录了文那卜华人社群曾经的热闹与繁华。

六、对比观察

以上六个以老越镇为中心散布开来的聚落，都是在半个世纪前因华人活跃的商业活动而一度繁华，无奈因时局变化，时至今日，六个地区的华人群体都发生结构性变化：发展条件不足的内推，加上城镇化的外引，让这几个地区的人力资源大量外流。

⁹ 令人惋惜的是，笔者在约一年后（2018年3月）再访文那卜，发现右侧半排店屋已倒塌，只剩下左侧的两间店屋，相信时日亦无多了。

城镇以外的华人聚落的变迁看似有着同一命运，不过通过对比观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各个地区依然有其独特的因素，致使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这些地区的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迁移情况，因此在普遍呈衰退状的聚落依然保持本身的维持姿势，无论是完全消逝还是艰苦经营，各个地区的华人群体仍然想方设法善用尚存的条件继续生计。

表1：老越外围华人聚落发展情况

聚落	地点	距离老越市镇	主要交通	开埠或聚落成形时期	经济高峰期	衰弱期及原由	现存华人口	华人地标
大老山 (Trusan)	老越镇西南面 大老山河畔	21km	陆路	1905年	1940年代	1960年代 公路通车 火灾	约400人	大老山福德宫； 中华小学； 16间木板旧店屋； 15间钢筋水泥新店屋。
顺达 (Sundar)	老越镇西北方	30km	陆路	不详	1970年代	1980年代 火灾	6户人家	天灵宫； 顺华学校。
甘榜阿瓦阿瓦 (Kampung Awat-awat)	老越镇西北方； 大老山河口	15km	水路 陆路	1800年代	不详	不详 人口迁移	1家 4口	“援利号” 水上杂货铺
本南 (Punang)	老越镇东面； 汶莱湾沿岸	12km	陆路 水路	不详	不详	不详 人口迁移	已无	废弃店屋
瓜拉老越 (Kuala Lawas)	老越镇东北方； 老越河河口	14km	陆路 水路	战前	战后	1960年代 公路通车	2户 4人	8间高脚木板店屋“码头式商铺”
文那卜 (Merapok)	老越镇东北方； 文那卜河畔	32km	陆路	战前	1950年代	1960年代 公路通车	1家	文新福德宫；废弃旧店屋

通过上表，便能发现这六个外围聚落的变迁程度和速度都有所不同，只是以今日老越镇不断获得发展的形势来看，中心的兴盛总是与周遭的落寞形成明显的对比。由于交通系统的进展与贸易形式的变化，如今各个乡镇有者日益败坏没落、有者艰苦维持、有者转型变质，其中最主要的现象，便是华人群体的迁移，导致这些地区的华人身影也逐渐消逝。

七、结语

老越周围的许多乡区小镇，在百年来的民生与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华人的身影。大老山、文拿卜、瓜拉老越、顺达、本南等地，皆是以华人商铺或商店为地标而形成的小型商业集聚地。在与老越地方耆老的访谈中不难发现，见证了这些地方当日的繁

荣与今天的没落，大家难免会倍感无奈，毕竟这些地方都是由华人奠下经济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不过数十年时间，政治体制和环境条件的变迁导致了居民开始集中在几个市区或城区，而这些一度繁荣的小镇区而今已然毫无竞争力而退出发展舞台，步入历史，等待消亡。

老越周边聚落的华人商业活动一直是当地明显的经济标志，不过无论曾经多么繁荣，依然抵不过时代的淘洗，日渐没落衰败。华人的刻苦经营，只能随顺社会形态的发展而不断调适，因此，与其说是华人造就了老越周边聚落的繁华，不如说是华人也只是聚落的社会化与城镇化发展中的随波逐流的一颗颗棋子。当年华人建起的商铺见证了这些聚落的兴衰，三代人的刻苦经营也在各个聚落的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只要政府政策一改，或者官方发展计划批下来，这些小型的经济结构便马上瓦解。留下或搬离、停业或转型、坚持或放弃，成为许多在地华商的艰苦抉择。

不过，观察了这些聚落保留下来的商铺，我们不难发现，大多商店还是很保守地以传统的经验方式来营运，虽然也知生意大不如前，却也坚持保留着原来的形貌，这或许是因为不愿意让前人的努力成果付诸东流，或许是因为店家自己和当地许多老顾客已经习惯了旧有的买卖模式，生意难做，就继续做。总之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当地华人稀有的坚持和安定。

岁月不居，随着老越镇区的继续发展，这些聚落的华人商店肯定会不断衰败下去直至消亡，不过当地华人也都做好准备，在镇区或他处安置妥当产业，只要条件再次具足，生意就能够继续做下去。

所幸的是，在感叹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在地前辈对老越的新一轮发展有着迫切和真诚的期待。尤其是新一代的华人开始在当地经济与政治领域崭露头角，他们不再以单纯的籍贯为华人族群内部的隔阂与冲突，而是努力整合资源，团结当地华人力量，一起继续建设老越成为宜居家园。

参考文献

- 常燕华，〈老越开埠逾百年与福建廖氏村的关系〉，《诗华日报》，2001年11月3日。
- 陈姿桦主编，1996，〈沧海桑田话老越〉，《老越中华俱乐部庆祝成立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老越：中华俱乐部，页63-65。
- 骏盛，〈无人不识、无人不晓麦耀琳〉，《国际时报》特写，1999年7月23日。
- 《老越中华学校创校一百周年纪念特刊》，老越：中华学校，2005，页17-40。
- 廖初殿等编，2010，《老越漳泉公会一周年特刊》，老越：漳泉公会，页51、54。
- 廖文辉，〈砂拉越廖氏足迹〉，《诗华日报》文荟，2015年9月13日。
- 廖宜洁，〈因为乡情，阿旺登雅重视老越发展〉，《联合日报》，2010年9月27日。
- 林美全，1997，〈老越福州人历史回顾〉，林美全编，《老越福州公会成立21周年暨会所大厦落成》纪念特刊，老越：福州公会，页85。
- 吕惠蒂、李宜福，〈边陲小镇老越〉，《星洲日报》吾乡吾土系列报道，2010年7月11日。
- 田农，1990，《森林里的斗争：砂朥越共产组织研究》，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页25-27。

- 吴德华，〈和平水牛之乡老越〉，《星洲日报》，2001年1月10日。
- 萧特财，〈廖姓人氏与老越发展〉，《诗华日报》，1990年10月7日。
- 雪兴，〈老越可升格为省吗？〉，《美里日报》特稿，1993年8月2日。
- 于翔，〈老越父老谈今昔〉，《美里日报》新年特刊，1992年1月1日。
- 〈政府8亿发展老越〉，《联合日报》特稿，2007年9月6日。
- 钟镛有，〈林梦、老越展翅高飞〉，《国际时报》，2010年12月5日。
- Chang Pat Foh. 1999. *Legends and History of Sarawak*. Kuching: Chang Pat Foh. pp.370-381.
- Haji Said Bin Haji Mohidin. 2010. *Pemberontakan di Brunei 1962*. Limbang: Haji Mohd Said Mohidin. pp. 96-98.
- Leonard Edwards. 1969a. "A history of the Lawas district-I". In *The Sarawak Gazette*, No. 1333. Kuching: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1 March. pp. 50-59.
- Leonard Edwards. 1969b. "A history of the lawas district-II". In *The Sarawak Gazette*, No. 1334. Kuching: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0 April. pp. 78-88.
- Leonard Edwards. 1969c. "A history of the Lawas district-III". In *The Sarawak Gazette*, No. 1335. Kuching: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1 May. pp. 109-117.
-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Preliminary Count Report). 2010.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s://www.sarawak.gov.my/web/home/article_view/240/175/. Retrieved on 21 September 2017.
- S. Baring-Gould and C.A. Bampfylde. 1909.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Kuala Lumpur: S.A. Majeed & Co.Sdn.Bhd. Reprinted 2007. pp. 377-396.
- Sanib Said. 2009. *Dahulu Terasing Kini Terjalin: Bahagian Limbang (Daerah Limbang dan Lawas)*. Limbang: Pejabat Residen Bahagian Limbang. pp.3, 11, 131.